

范廣欣，《以經術為治術：晚清湖南理學家的經世思想》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509頁。

### 丘文豪\*

晚清理學的研究雖在理學史史上不如宋、明、明清之際來得興盛，但由於太平天國之役與同治中興在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性，參與其中的湖南理學家一直是晚清思想史、政治史研究中相對受到重視的思想群體。相關研究中較具代表性的有：定下研究基礎的錢穆，<sup>1</sup>進行初步研究的陸寶千，<sup>2</sup>與以「理學主敬」、「理學經世」為此領域劃出較為整體的脈絡與全貌的史革新等人。<sup>3</sup>此後眾多在「理學」框架下的研究則以介紹為主，<sup>4</sup>多半注意個別士人的理學思想，並觸及唐鑑、倭仁主持的北京理學圈子；<sup>5</sup>較難有整體性的認識，更遑論突破性的創發。本書便在這樣的研究背景下，試圖以整體脈絡的線索串連晚清湖南的理學家。

本書為范廣欣博士論文（2002）改寫，作者曾以單篇論文發表過本書部分

---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sup>1</sup> 錢穆，〈曾滌生（附羅羅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下冊，頁631-660。

<sup>2</sup> 陸寶千，〈晚清理學〉，收入氏著，《清代思想史》（臺北：廣文書局，1978），頁323-438。

<sup>3</sup> 史革新，《晚清理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34-36。

<sup>4</sup> 如龔書鐸主編，史革新、李帆、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上、中、下三卷本，便是廣泛地介紹清代理學家及其著作。

<sup>5</sup> 余英時，〈曾國藩與士大夫之學〉，《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頁304。並可參考李陵，〈唐鑒講學京師與晚清理學群體的形成〉，《蘭州學刊》，2008年第7期，頁137-140；張晨怡，〈清道光年間理學士人在京交游述論〉，《北京社會科學》，2005年第4期，頁89-93。

章節。除緒論、結論外，全書共分三部九章。

在〈緒論〉中作者指出，晚清理學本是思想史、哲學史研究中易被忽略的時段，雖有若干個別晚清湖南理學家的研究，但鮮少將其視為一「思想家群體」。因此作者看重三個特點：一、事功與學問緊密結合；二、彼此透過友誼、婚姻關係凝結為整體；三、同中有異，可探究不同流派的特性與其間的聯繫、轉化，而選擇劉蓉、羅澤南、郭嵩燾與曾國藩作為研究群體。本書之「經」是指包含了理學、史學，卻不包括陸王心學的儒家傳統經典；「理學」特指程朱一系；「經世」著重在政治、軍事、外交等治術事功。此外，作者的問題思考為「思想如何指導實踐，實踐如何改變思想」，因此除了思想史常見的文本細讀外，也特別留意社會、歷史背景，並採跨領域研究方法。

第一部分〈「以經術為治術」的理論創發〉共分三章，討論「以經術為治術」的理論建構。第一章〈現實感與救世精神：劉蓉對理想程朱的建構〉指出程朱學色彩最純之劉蓉重視實踐、功夫步驟、外在標準與知識，融合了考據學風與經世致用的時代精神，展現之「現實感」與「救世精神」為晚清湖南理學家的共同學術淵源，以及「以經術為治術」的理論基礎。第二章〈從批判到參與：太平天國戰爭前羅澤南的轉向〉根據羅氏著作的時序細讀，指出羅氏在太平天國戰爭前以「批判」為主的經世態度，以及其中蘊含的「參與」傾向，接著由批判轉為參與，最後則有教化百姓與政治實務的兩條政治參與進路。第三章〈從義理到經世：郭嵩燾對朱子的繼承和質疑〉討論郭氏出使英國以前的思想根柢與學術立場，透過細讀、比較，指出郭氏以重事功、禮及外在規範之經世之學為主導。

第二部分〈「以經術為治術」的實踐：曾國藩「禮學經世」說與同治中興〉，分三章討論「禮學經世」提出的時間、涵義與特點，學術淵源與背景，實際運用與成敗。第四章〈「禮學經世」說的提出及其內容和特點〉，指出完成於咸豐九年（1859）的〈聖哲畫像記〉表示曾氏已建立重「禮」外在規範意義的「禮學經世」框架，以及以禮學為紐帶，以經世為目的的「禮統」。第五章〈「禮

學經世」提出的學術源流和社會歷史背景〉論曾氏禮學雖受考據學的影響，並以理學為基本價值觀與安身立命處，但仍從屬於「以經術為治術」與「經世」。第六章〈「禮學經世」的運用和侷限〉討論曾氏禮學經世的實際運用。

第三部分〈「以經術為治術」的實踐：郭嵩燾對「懷柔遠人」的詮釋與近代外交〉，論「以經術為治術」在轉型時代中的潛力與侷限。第七章〈郭嵩燾與「懷柔遠人」的另一詮釋傳統〉注意郭氏出使英國前辦理洋務的經驗及其傳統學術活動。第八章〈郭嵩燾「遠人」觀念的變遷〉探討郭氏對外國人看法的轉變。第九章〈從三代之禮到萬國公法〉說明郭氏透過丁韞良的譯本認識萬國公法，並實際在國際事務上運用萬國公法。

在〈結論〉處，作者總結「以經術為治術」為義理、考據、經世之學的整合，並將「以經術為治術」歸屬於晚清經世傳統中的第二階段，為針對第一階段龔自珍、魏源的反動。最後，作者也論及中共領導人對湖南理學家精神的繼承。如毛澤東成長時受曾國藩思想的薰陶，成長後以湘軍後人自居，其堅強意志與道德理想主義便是儒學所塑造；劉少奇關於黨員修養的說法也可見晚清理學家影子。

本書最特別處有二：一是以「以經術為治術」為主題，跳脫過去就理學看晚清理學家的「理學經世」框架，注意到除理學外，湖南理學群體也廣泛從儒家經典中挖掘資源為其功業的基礎。二是將過去多以個案處理的湖南理學家視為一個有內在思想聯繫與共通的群體（頁 23）。

首先，作者正視以「理學經世」為框架可能產生的誤差，並從「經學」的角度注意到羅氏以理學為精神背景以外的其他知識資源與準備工作；曾氏建構之「禮統」，除政治制度外，對風俗、宗教儀式的重視，以及對軍禮（營規、營制）的建構與完善（第六章）。由於跳脫「理學經世」的框架，作者得以將視野從過去研究較多的北京理學圈，轉移到本書的「經術經世」圈，並將定義過大的「經世」集中在禮學、政治、軍事、外交等事功上。接著，作者拉出一條「以經術為治術」的發展線索，第一部分以劉、羅、郭三人（未論及曾氏）

之學術著作爲共同的學術淵源與特色（頁 31），指出劉蓉對其他人的影響，以及重視外在標準與實踐步驟（頁 43），暗示了第二部分曾國藩思想特色的基礎。在專論曾國藩處則以「禮學經世」爲關鍵，既是「以經術爲治術」的明確方向，也是湖南理學家們的共識（頁 225）。郭嵩燾繼承了羅澤南對世界的興趣（頁 167），彌補了「禮學經世」的不足，爲湖南理學家事功思考的總結，並規定了同光中興時期重建禮樂的儒家方向（頁 373）。

除了全書的框架與論述線索外，本書在方法上也有許多優點。正如作者所言，過去研究晚清湖南理學家時，往往引用孤立的文句而忽略文本的時序（頁 28、92-93），本書則建立在文本的細讀基礎上，如第一章劉蓉對陸世儀的批評；第三章郭嵩燾與朱熹的比較；第七章郭嵩燾「懷柔遠人」的解釋。在研究羅澤南時，作者展現的文本細讀功夫最爲突出，同時又不侷限於文本，而留意羅氏之轉折與其身分改變以及外在客觀條件的關係（頁 134），並也注意到羅氏不同作品的目標讀者均有不同（頁 144）。此外，作者特地至長沙湖南圖書館閱讀羅澤南《皇輿要覽》（頁 147），並指出其世界知識可能來自明末清初耶穌會士（頁 155-158），可見作者蒐羅史料之勤，以及對史料可能蘊藏議題的敏感。此外，本書採取跨領域的操作方法，涉及政治史、社會史、外交史與軍事史（頁 27）。雖然僅使用了若干相關日記、奏稿，觸及思想以外的層面，但仍有助於跨出思想史角度，思考中國現代化中傳統與現代的關係。譬如以視儒家價值觀、思維方式無法幫助中國在現代世界中生存的芮瑪麗（Mary Wright）爲例，她認爲同治中興以人才道德爲考量，除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海關稅務司外，並沒有行政程序、制度上的改革，也沒有作爲中堅分子的中層軍官。<sup>6</sup>然根據本書第六章〈「禮學經世」的運用和侷限〉，曾國藩以經學、戚繼光的兵學思想爲資源，本三代精神因時創立「營規」與「營制」以訓練軍官，由曾氏以身作則，層層管轄、落實，並以儀式深入軍官與士兵的日常，強

<sup>6</sup> 芮瑪麗（Mary Wright）著，房德鄰等譯，《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84-87、246-248、263。

化其精神、士氣、鬥志與道德，同時也展現對火器的重視。而本書指出學術創新與白銀供給對同治中興成功的影響，也可交互思考。<sup>7</sup>

接著，筆者也將閱讀過程中產生的疑問提出如下：

如前述，本書不以地域（頁 20），而以「以經術為治術」將劉、羅、郭、曾視為一區隔於其他儒者，而有內在聯繫、傳承的「晚清湖南理學家」群體。但書中對這內在緊密、外在區隔一體兩面的說明，仍有不盡之處。

本書結構以四人分章，雖然作者自言會著重彼此間的對話與爭論，各章節卻甚少交集（頁 27）。第一章僅用若干書信說明劉氏對其他人的「影響」（頁 43）。第二部分少見曾氏與前述三氏的互動，更不用說思想交往。第六章雖以曾氏給劉蓉的信作為開頭，但此信只是曾氏說明古禮無詳細記載的軍禮（頁 303-305），無涉理學；且本章強調的是劉傳瑩在考據學方面對曾氏的影響、禮學的接引。論郭嵩燾處，僅在第二章指出羅澤南的批判精神、民本思想、君臣共治以及對外部世界的興趣由郭氏繼承與發展（頁 167），但也未加論證。第三部分除〈引論〉提到郭氏的著作為湖南理學家事功思考的總結，並規定了同光中興的方向（頁 373）外，也見不到與三人的互動、影響。

除了互動面不明顯外，「理學」作為本書思想群體的特徵，本書選取的四個人是含括在何種意義、程度的「理學」之下，也並不清楚。如第二部分論曾國藩時，作者以「安身立命之處」及「經世基本原則」為其「理學」之依據（頁 232、262-263），然卻見不到劉、羅、郭的理學理論對曾氏有何影響。此外，當曾氏明確提出「禮學經世」主張時，引用的是考據學者劉傳瑩而非前述三氏（頁 312）。至於郭嵩燾，其實對經典的諸多解釋已經與朱子有很大距離，如將《中庸》轉化為社會政治思想與工夫、重外在規範等，便與朱子多言性、命不同，畢竟朱子視《中庸》為「初學者未當理會」；「多說無形影，如『鬼神』、『天地參』等類，說得高；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sup>8</sup>此外第三部分論郭

<sup>7</sup> Lin Man-Houng, *China Upside Down: Currency, Society, and Ideologies, 1808-1856*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sup>8</sup> 朱熹，〈中庸一·綱領〉，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

氏外交處，更幾乎不見理學身影。如此僅以郭氏肯定朱子「切己之學，循序漸進之功」（頁 172），及其主觀認為自己與朱子屬同一傳統（頁 210），便將其視為理學家，那清代其他大量有類似思想傾向卻被作者排除在外，其原因為何？簡而言之，作者並沒有凸顯出作為一個「集團」所共同具有的「理學」核心特徵，彼此間的緊密傳承、互動與影響，反倒將「理學」視為該群體一個不證自明的前提。

至於與其他晚清儒者、理學家區隔時，筆者也對其標準有些疑問。作者首先肯定「以經術為治術」為今、古文、理學家共同的理想，但只有湖南理學家成功地實踐這一目標（頁 12）。倭仁、唐鑑沒有事功，胡林翼、左宗棠沒有經學著作（頁 5-6）。但若胡氏編輯兵法地理書籍而與經學關係不大，那麼何以羅澤南之《皇輿要覽》與曾國藩以戚繼光為思想資源的「營制」便是禮學經世的一面（頁 315）？又極端言之，在「經學時代」，<sup>9</sup>何人不在經學框架內從事學術與事功？此外，本書處理同在「經世」方面有突出表現的魏源時也不能說服筆者。作者認為《皇朝經世文編》主要以實用、當代為準則（頁 3 註 1），只有治法，著重以技術層面解決官僚行政問題，對「經」無深刻見解並連結至事功（頁 10）。本書所論述的湖南理學家便有這方面的特質（頁 482）。然而學者早已注意到《皇朝經世文編》除了「用」與「治術」外，也包含「體」的修身與經術。<sup>10</sup>若湖南理學家重五經也以四書為精神指導（頁 66），即是事功與經學、理學的連結，魏源為何就不是？

除對群體特徵、內在聯繫傳承，以及與其他儒者之區隔說明不足外，在作者設定探討群體的「同中有異」處（頁 7），也仍有可補充之處。作者說明因

---

冊 4，卷 62，頁 1479。

<sup>9</sup>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增訂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下冊，頁 492。

<sup>10</sup> 詳參黃克武，〈《皇朝經世文編》學術、治體部分思想之分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丘為君、張運宗，〈戰後臺灣學界對經世問題的探討與反省〉，《新史學》，卷 7 期 2（1996 年 6 月），頁 181-231；解揚，〈近三十年來有關中國近世「經世思想」研究述評〉，《新史學》，卷 19 期 4（2008 年 12 月），頁 121-151；韓承樞，〈評介兩岸學界近十年有關《經世文編》的研究概況〉，《史原》，復刊期 2，總期 23（2011 年 9 月），頁 205-238。

藉由劉蓉呈顯程朱陸王之爭的政治意涵（頁 96），故不討論羅澤南《姚江學辨》。但劉蓉的王學態度能否代表其他三人？作者指出劉氏為最堅持程朱者，也批判過《姚江學辨》沾染王學（頁 61）；而曾國藩對王學比較包容，也有所肯定。<sup>11</sup>要探究群體間細微的差異，此處或許正可深入討論。另外第八章〈郭嵩燾「遠人」觀念的變遷〉說明要以郭氏的學術著作及奏稿（頁 398）進行研究，但實際上只使用了奏稿。

最後，本書展示依時序、跳脫「理學」框架的文本細讀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來研究影響湖南理學家甚深，或交往密切的其他理學家。而本書沒有觸及的清中期理學對晚清理學的影響，或許也可納入考量。<sup>12</sup>如此不僅可以更加瞭解晚清理學的樣貌，也可以對清代理學整體有更深刻的認識。

---

<sup>11</sup> 龔書鐸主編，張昭軍著，《清代理學史》，下卷，頁 165-166。

<sup>12</sup> 如張瑞龍就認為乾嘉考據學與道咸理學復興之間缺少一「過渡環節」，因此注意到嘉慶朝後期由於天理教的緣故，開始提倡理學。張瑞龍，〈天理教事件與清中葉文化政策的轉變——以嘉慶朝為中心的考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1（2011 年 3 月），頁 51-87。